

朱子学研究

龙念 ■ 主编
解光宇 ■ 副主编

二〇〇八年卷

元祐大字手稿

卷四

张夫元诚南作

书

行草连章卷首曾海日书
想家西湖水秋末繁诗你

东清

小山此杜慕底莫蕩日色

在局间虚波秋风渺月色

咏归桥

深阳于桥水来相跨水橋

舞雪半霜爭歷玉夕相

红齋

考槃體立陸漫浪水而游

石尔漠洲趣難忘覩閒心

鼎澤堂

空後林陰涼堂前渺水游
底更懷多是余多夢如尋

Z H U Z I X U E Y A N J I U

安徽大学出版社



朱子學研究



安徽省朱子研究会 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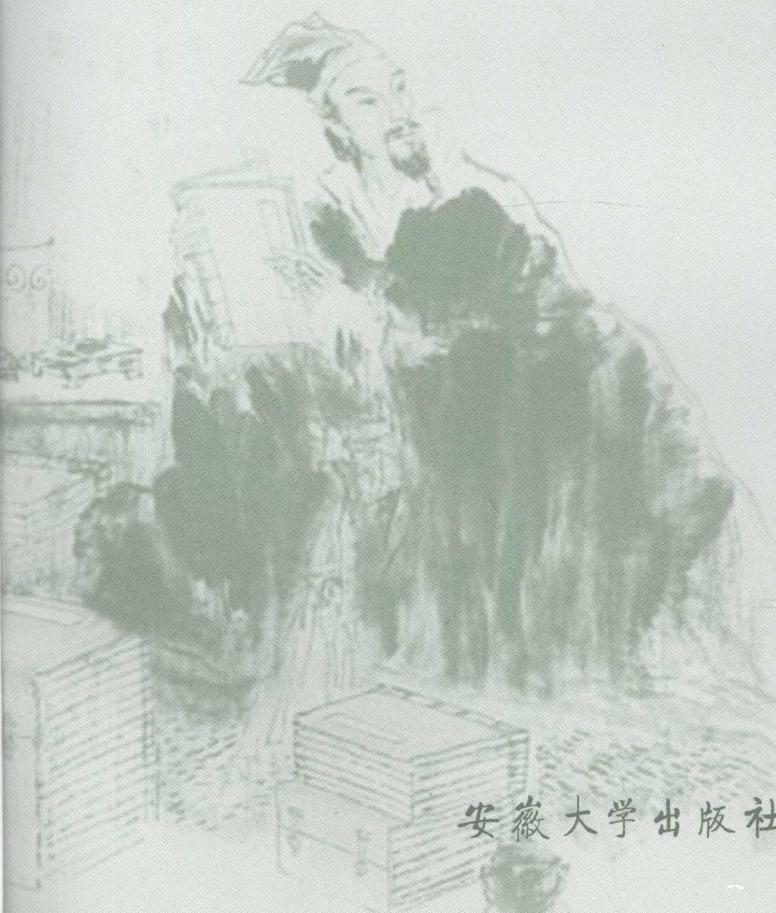
朱子学研究

二〇〇八年卷

龙念 ■ 主编
解光宇 ■ 副主编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 资助出版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子学研究 / 龙念主编.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81110—484—4

I. 朱... II. 龙... III. 朱熹(1130~1200)—理学—
哲学思想—研究 IV. B2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4388 号

朱子学研究

**龙念 主编
解光宇 副主编**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458 发行部 0551-5107784	开 本	710×1000 1/16
E-mail	ahdxchps@mail.hf.ah.cn	印 张	16.375
责任编辑	徐 建	字 数	295 千
封面设计	孟献辉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484—4

定价 26.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朱子民本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及其现代意义

——在“朱子民本思想与当代”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 龙念(1)

朱熹的民本思想 张品端(7)

朱熹与中国古代以民为本思想 敦堃 范伟奇 周挺启(12)

谈朱熹的民本思想与为政实践 汪银辉(21)

朱熹民本思想、仁政实践及其现代价值 吴莺莺(27)

朱熹的赋税思想与“黄宗羲定律” 方彦寿(37)

朱子社仓与道学家的社会理想 连燕春(42)

略论民本思想的形成、转化和超越 杨国宜(50)

论朱熹民本思想与实践 方利山(58)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举隅 张成权(61)

朱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朱子民本思想与当代”学术研讨会综述 詹向红(72)

朱子理学

——礼学的本体提升与普世效应 孙以楷(77)

理学与释“理”

——试论戴震对朱熹学说的评价 沈时凯(86)

朱子《家礼》与道德建设 史向前(99)

前《仪礼经传通解》时期朱子制礼的历史特征及其指向 程继红(106)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马育良(116)

论朱子的和合思想 王 颖(131)

朱熹知行观的双重意义 赵懿梅(139)

论朱熹的“理治”思想

——兼论朱熹对拯救南宋政治认同危机的理论贡献 ... 毕民智(144)

程朱理学的现代审视 吕美生 孔正毅(153)

朱熹新杂家论 徐公喜(157)

文化朱熹之若干蠡测 肖美丰(160)

从谈迁的一篇文章谈起 诸伟奇(166)

史学之功臣乎？罪人乎？

——兼与《评朱熹对史学的基本态度》一文商榷 ... 许家星 李自耕(172)

理学家的书法观

——论朱熹在书法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 胡长春(178)

武夷山摩崖石刻与朱子理学思想 朱平安(186)

南宋官学与书院的办学思想 李永卉 赵小勇(194)

朱熹与南宋闽北书院 徐 伟 涂怀京(201)

儒学特质论 解光宇 解 立(208)

儒家政治哲学与社会理想 傅小凡(215)

略论“孔颜乐处”..... 杨国平(226)

- 论程朱法治思想及其对徽州宗法制度的影响..... 郑 刚(232)
朱子与呈坎..... 罗会定(235)
论新安理学家谢璇..... 石 磊(237)
祝穆及其著述..... 蒋艳艳(244)
陈栎及其宗朱论..... 洪功兵(247)
论汪循思想及其价值..... 王 凡(251)
程瞳及其“反求诸身”论..... 解苗苗(254)

朱子民本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及其现代意义

——在“朱子民本思想与当代”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龙念

在黄山区委、市政府、市政协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安徽省朱子研究会与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福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反复磋商，以及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朱子民本思想与当代”理论研讨会今天开幕了。

黄山市所属的歙县篁墩是宋代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的祖籍地，也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祖籍地。以程朱思想为基础形成的新安理学，是儒学的重要派别，在徽州地区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徽州又有“东南邹鲁”、“程朱阙里”之称。

在朱熹的祖居之地举办这次理论研讨会，主要目的是展示和交流专家学者们的朱子学研究成果，探讨朱熹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进一步发掘朱子学说中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为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服务。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皖、赣、闽三省学者，还有北京、上海、浙江、山东、陕西、广东等省市的学者，这是朱子学研究的一次盛会。借这个机会，我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和问候，也向为会议提供有力支持的安徽省有关方面和黄山区委、市政府、市政协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朱子与皖、闽、赣有深厚的渊源关系

这次会议选在黄山市召开，对于朱子学研究来说，具有历史追寻的意味。

回顾朱子的家世和生平可以看到，与朱子关系密切的地域主要有三个省：一是福建，那里是朱子的出生地、求学地。朱子一生主要活动区域在福建，晚年则定居在福建，从事著述和教学。因此，他所创建的朱子学派又称为“闽学”。二是江西，那里是朱子思想的重要形成地，也是朱子为官和从事教育活动的主要地方。朱子与吕祖谦、陆九渊及其弟子齐聚上

饶鹅湖寺,切磋理学,使之成为南宋学术界最重要的一次集会,对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子在知南康军任上为教育做了很多实事,特别是修复白鹿洞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三是安徽,特别是徽州。这里是朱子的祖居之地,朱子父子都在这里留有遗踪。朱子的父亲朱松曾在当时为府城的歙县读书,歙县富商祝确很器重他,并将女儿嫁给了他,这就是朱子的生母祝氏夫人。朱松入闽后,对徽州很怀念,刻了一方“紫阳书堂”的印章,并以“紫阳”名其居。朱子对徽州感情极深,在他的著述中,常常以“新安朱熹”、“紫阳朱熹”落款,并且两次回徽州省亲、扫墓,每次都逗留数月,从其问学的徽州学者很多,在徽州有深刻影响。“新安理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徽人对朱子又有深厚的感情,后人为了纪念他,建了紫阳书院,紫阳书院内有朱子殿,该殿存有清康熙皇帝御书“学达信天”匾和乾隆皇帝御书的“百世经师”匾,还有清户部尚书曹文埴题写的“古紫阳书院”牌坊等。这些遗物有的至今仍保存完好,有的却破损严重,而今正在抢救中。因此,由三省的专家学者率先打破地域界限,联手召开朱子学研讨会,共同打造朱子学研究的学术平台,携手研究朱子,确实是一件有意义也有必要的事。

2. 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源远流长

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早期与其他民族一样,产生过自然神和灵魂不灭的观念,出现了原始宗教。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把原始宗教改造为“人为宗教”,宣扬天帝神明决定一切的“神”本论,即“天命”论,认为自然现象受神明支配,人间的一切活动需要遵循神的意志。秦汉以后“君本”思想处于统治地位,帝王权力也是神所赋予的,因此出现“君权神授”的“天人感应论”。

随着历史的变迁,朝代不断更替,许多先哲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逐渐形成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始于商周之际,发展于春秋时期,流行于战国时代。先秦以后历朝历代直到近代、现代,民本思想得到长足发展。《史记》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与此同时,奴隶起义、国人暴动时有发生,人民力量开始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进步的思想家都对“民”的作用重视起来,他们将君民关系喻为“舟水”关系、“鱼水”关系,“民惟邦本”逐渐成为共识,并出现许多民本思想的表述,其中许多论述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例如:

《尚书》有“皇祖(大禹)有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老子提出“贵以

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孔子提倡“仁者爱人”^①；孟子主张“民贵君轻”^②；荀子则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比喻。汉、唐以后，有一些开国皇帝特别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他们对人民的力量看得比较清楚。如唐皇李世民在总结隋王朝灭亡的教训时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又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亲身参加了农民起义，所以深知人民的力量。他一方面强化中央集权，一方面让农民休养生息，采取了奖励垦荒、严禁土地兼并、严惩贪暴等一系列措施。晚清时期的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由于受到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主张具有现代民本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又发展了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它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是社会实践的总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3. 研究朱子的民本思想，拓展朱子学的研究领域，全面反映朱子思想

众所周知，朱子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子思想被官方认可，并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中华儿女，还影响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朱子本人也因此而成为继孔孟之后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者。

朱子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发展了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像主旋律一样贯穿在朱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中。朱子不仅继承了儒家“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的政治观念；还针对当时的政治现实，提出了“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王道以得民心为本”，还提出“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等等。所谓“社稷亦为民而立”，是指国家是为人民而建立的，必须以人民的要求作为自己的目的。按照他的这个观点，国家造福于民，应是一种职责，使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是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什么惠政，更不是什么恩赐。这表明，他在继承“民惟邦本”的传统民本理念的同时，对民本思想又有所发展。他继孟子“民贵君轻”思想之后，把民本思想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朱子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了民本思想，而且还把民本思想付诸实践。他为官不到十年，但先后在知南康军、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期间，为民做了许多实事、好事，如兴办教育、恤民

^① 《论语·颜渊篇》：“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② 《孟子·尽心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救灾、清正肃贪等，颇有建树。这正是他的民本思想的应用和体现。

第一，办好教育是朱子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朱熹为官所到之处，为教育办了许多实事。例如：亲自拨款修建校舍；整顿和创办了一些县学、州学；重建了宋代著名四大书院的江西白鹿洞书院和湖南岳麓书院；为学校收集藏书；聘请名师任教；选拔贤才担任校舍负责人；批准学田，解决学校长期经费供应难题；以政府名义发布榜文，保护学校财物和秩序；等等。他还亲自编撰教材，亲自为学生授课，经常为学生解答难题，对学生诲诱不倦。朱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其主要精神是按照儒家圣贤的教导，实行封建的纲常伦理，为维护和稳定封建专制政权服务。他亲自为白鹿洞书院制定五个方面学规，这些学规后来成为各学校书院订立学规的标准，影响深远。其中有些条文对今天的教学仍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第二，薄赋恤民是朱子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他上疏朝廷说：“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他认为薄赋恤民乃“王政之本”。在任职期间，他采取了一系列减免税和整顿赋税名目的措施。为了恤民，他修荒政、薄赋敛、轻劳役、立社仓、苏民困、重农业，鼓励生产，把救灾和兴修水利结合起来。因而大灾之年，人民生活仍然安定。因此，他上受到皇帝嘉奖，下得到百姓称赞。朱子高瞻远瞩，救灾不仅看到当年和来年，甚至考虑长远之策；不仅看到天灾，还看到苛捐杂税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他上疏皇帝，指出 10 个方面政弊，提出许多远见卓识的对策，如“行经界”这样重大的改革措施，即重新核实田亩，实行随田均产，克服有田不纳税，无田而纳税的怪现象。这样既可以减少佃民的负担，又可增加政府的收入。可惜这项公正而合理的主张，却由于遭到官僚富豪的抵制而未能施行。

第三，惩贪安民是朱子民本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朱子为官清廉，为百姓伸张正义，甚至不顾个人安危，竭力同朝中贪官和权贵抗争。他有段名言：“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江西、浙江、湖南等地做官，由于为官勤奋、清廉，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所以不断得到提拔和重用。他每到一地，轻车简从，深入到农村和百姓之中，了解民情，关心百姓疾苦，研究现行政策，为政多有建树。他在浙江救灾时，得知一些地方官贪赃枉法，目睹许多百姓因受残酷剥削和严重灾荒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凄惨景象。为此，他大胆奏劾了绍兴府贪污灾粮的官员，又弹劾衢州隐瞒灾情、谎报政绩的官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不顾个人安危，不畏强暴，六次上疏朝廷，弹劾宰相王淮的亲戚——台州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养蓄亡命，

偷盗钱粮,伪造官会”等多种罪行。唐仲友的罪行,若依法论处,皆是死罪。但由于权贵的庇护和皇上的昏庸,他并未受到惩罚,以异地做官了事。朱子抓住不放,继续上疏问朝廷,在众怒之下,为了缓和舆论,朝廷不得不罢免唐仲友江西提刑新职,但唐仍未受到法律制裁。

朱子努力将其民本思想付诸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推动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的民本思想是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所以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他的民本思想是把希望寄托在皇帝的善心和理智上。他不厌其烦地先后向孝宗和宁宗皇帝大谈“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劝说皇帝要以身作则,遵照儒家经典的义理办事。还批评朝廷不应在京畿百姓遭灾之年大兴土木,要求宁宗皇帝“下诏自责,减省舆卫”。这就触怒了皇帝,于是朱子仅在朝为官40天,就受到“落职罢祠”的处分,还被列为“伪学逆党”的首领。朱子的愚忠不能不是一场悲剧。

朱子的民本思想很丰富,它留给我们的思考也是深刻的,其精华部分在当今仍具有借鉴意义。这些民本思想需要也值得专家学者们去发掘,去研究。如果通过这次会议,能够引发学术界对包括民本思想在内的朱子思想研究的进一步关注,能够产生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那么这次会议就很有收获了。

4. 弘扬朱子的宝贵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5年,安徽省朱子研究会与深圳万丰集团联合召开了“朱子学说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曾就朱子学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意义进行了研讨。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上次会议的延续和深化。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与古代的民本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相同因素,又有根本区别。今天的以人为本来源于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来源于对历代民本思想批判的继承。两者的根本区别是政权的性质和为什么人的问题。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提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段话全面而深刻地回答了以上问题。

再从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发展最快的时期,是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最好时期。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公共社会服务部门,追求商业利润;一些领域的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公仆”变成了“主人”;污染严重,自然环境恶化等。这些都涉

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积极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这几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取消几千年来“皇粮国税”；增加对“三农”的投资；取消中小学学杂费；关注弱势群体，逐步建立城乡社会低保；打击假、冒、伪、劣，严查贪污腐败等等，给人们以希望和信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一定会实现。

我们研究传统文化，就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朱子的民本思想是传统文化遗产中的重要部分，弘扬朱子留下的宝贵思想，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朱子学说的研究是一项艰巨而繁难的学术研究工作，需要专家学者们付出艰苦的劳动，更需要专家学者们携手合作、共同努力，同时，也需要有共同研究、交流、切磋的平台。皖、闽、赣三省朱子研究机构联手召开朱子学研讨会，正是为专家学者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希望专家学者能够支持办好这个平台，使它在深化朱子学研究，拓宽朱子学研究领域，改进朱子学研究方法，不断提高朱子学研究水平方面，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 [1]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一百三十卷，北京：中华古籍出版社，2005。
- [2]佚名：夏书·五子之歌，见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 [3]李聃：老子·第三十九章，见范永胜：老子注·合肥：黄山书社，2005。
- [4]王先谦：荀子集解·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88。
- [5]吴兢：贞观政要·第一卷·君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6]司马光：资治通鉴(下册)，第一百九十二卷·唐纪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第十四卷·尽心章句下，见朱子全书(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第一卷·梁惠王章句上，见朱子全书(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陆)，第一百卷·劝农文，见朱子全书(贰拾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壹)，第十一卷·庚子应诏封事，见朱子全书(拾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1]朱熹：朱子语类(伍)，第一百一十二卷，论官，见朱子全书(拾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朱熹的民本思想

张品端

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之一。早在《尚书》里，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西周时代，周公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把天命这个最高权威与“民”相联系，从此以后，“民”就成了全部政权的核心。孔子对“三代”民本思想进行了一次总结，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主张。孟子发展了孔子的重民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荀子又进一步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思想。

朱熹对传统的民本思想作了理论性的阐释和发展。在注释《孟子》“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时，朱熹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这在封建专制制度日益强化的宋代，无疑是触到了封建专制的症结。它对后来我国“民主”思想的启蒙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注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朱熹明确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的思想，指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可见，朱熹认为国家以民为本，社稷是为民而设立，而君主的地位，取决于国家社稷的存亡。民既然为国家的根本，那么统治者就要努力去争取民心。朱熹说：“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则所以清矩而与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就是说，握有天下大权的君主，必须“与民同欲”，才能得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几千年来统治经验的总结。鉴于此，朱熹提出了“王道以得民心为本”，“发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而“使民有常产者，又发政施仁之本也”的思想。将“王道”、“仁政”作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体现了朱熹“民本”思想的深化。朱熹在阐述“得民心”时，还提出“近民”的主张，他说：“平易近民，为政之本。”朱熹的这些民本思想，成为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精华。

朱熹的“重民”主张，具体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是：

一、爱民如子

朱熹“君民之情相亲”的观点，就是要求做到君主“爱民如子”，臣民视君“如父母”。在注释《大学》时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他说：“言能矩而以民心为己心，则是爱民如子，而民爱主如父母矣。”这就是说，“有天下者”如能与民同好恶，以民心为己心，做到“爱民如子”，老百姓就会对他“爱之如父母”。那么，怎样才能“爱民如子”呢？朱熹认为：

首先，要省赋。赋税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朱熹十分重视赋税问题。但是他强烈反对“重敛”，主张“薄赋”或“省赋”。朱熹说：“量入为出，罢去冗费，而恶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他还曾对最高统治者孝宗说：“臣窃闻陆贽有言：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其心伤则本伤，其本伤则干涸瘁而根柢蹶拔矣。”由于赋税太重，致使民间“人无固志，生无定业，不肯尽力农桑以为子孙久远之计”。朱熹认为：“须一切从民正赋，凡所增各色，一齐除尽，民方始脱净。”故他提醒封建统治者，必须为国家长远利益考虑，催征赋税，切莫竭泽而渔，否则人民流亡，赋税无人，国家损失会更大。

为了实现“省赋”，朱熹在任南康军知军、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漳州知州时期，曾经采取了一系列蠲免税钱和整顿赋税名目的措施。如在南康任时，不仅在自己权力范围内，减免部分正税和无名苛赋，而且还奏请朝廷减免南康军所属各县赋税。在孝宗皇帝恩准下，南康所属三县“申减秋苗、夏税、木炭、目桩、总经制钱”，“乞蠲本军阁租苗米四万七千余石，检放三万八千余石”。要实现省赋，朱熹认为必须同时惩办贪官污吏。农民之所以破产，他认为是“今时仕宦之人不务恤民，多是故纵吏胥，畏惮权豪”所致。他说，只有“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后刑罚可省，赋敛可薄”。因此，朱熹曾多次亲自出面要求朝廷惩办贪官污吏。朱熹的“省赋”主张，虽然在当时封建社会不能起到治本的作用，但其见识已超过了当时一般的官僚。

其次是恤民。朱熹认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他把恤民看成国家之大务，并建议朝廷要“勤恤民隐”。在朱熹看来，政府要勤政体恤，慰其民心，这样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太平无事。朱熹不论是为官还是闲居，都十分重视恤民，他在任同安主簿期满，闲居家乡崇安县开耀乡（今武夷山市五夫镇）时，为了积谷备荒，于乾道四年（1168年），

与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共同创办“社仓”。社仓设在农村，藏粮于民，惠及乡村饥民，是我国古代荒政史上一大创举。在南康军任职时，朱熹积极筹粮救灾，“活饥民大人十二万七千多口，小儿九万余口”。此外，他还募民修堤，以工代赈，既解决了灾民的缺食问题，又修筑了河堤，“实为公私久远利济之惠”。在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时，朱熹深入灾区了解民情，为民请命，力求“民被实惠”。他在赈饥的同时，严惩趁火打劫、贪污勒索的地方官吏。最终，他因势单力孤，在官官相护的封建巨网面前，丢掉提举官职。可见，朱熹恤民、安民、为民思想之一斑。

再次是宽民力。朱熹特别反对繁重的夫役妨碍农业生产，主张轻役。他在知南康军时，曾下令约束管下各县滥派夫役。南宋孝宗时，在全国各地试行“义役”制，即役户共同出钱买田，资助当役之人。但实际上义役田和役次摊派都被豪强把持，下户吃亏。朱熹批评这种“义役”制是“困贫民以资上户”。朱熹还主张要“爱养民力”，他说：“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在朱熹看来，只有“宽民力”，使民得以休养生息，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

二、取信于民

统治者要得民心就必须取信于民。怎样才能取信于民呢？朱熹认为，凡事出于公心，就能取信于民。他说：“公心素有以信于民，民自乐之，虽非法令之所得为，然使民宜之，亦终不得而变也。”朱熹对这一思想，在其代表作《四书集注》中进行了反复阐述。在注释《论语》“敬事而信”时，朱熹说：“敬其事而信于民也。”在注释《论语》“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时，他说：“仓禀实而武备修，然后教化行，而民信于我，不离叛也。”在注释《论语》“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时，他说：“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只要统治者能做到“宁死而不失信于民”，那么“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统治者。这样，上下互“不失信”，国家就能得以巩固。

朱熹提倡官员做事都要讲“公”字，以取信于民。他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字。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不论官位高下和官职大小，做事都要讲一个“公”字。官员能够秉公从政，便做事精彩；即使小官，也让人敬服；而那些做事不公，即使是身居要职的宰相，最后也落得个晚节

不保。在朱熹看来，只有秉公办事，才能取信于民。能否取信于民，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之大事。

三、与民同乐

朱熹认为，爱民和信民的重要途径是要与民同乐。他说：“学者之要务，在于知与民同乐为乐之本。”这就强调了“与民同乐”是乐之本。朱熹在注释《孟子》一书时亦说：“孟子言文王虽用民力，而民反欢乐之，既加以美名，而又乐其所有。盖由文王能爱其民，故民乐其乐，而文王亦得以享其乐也。”在这里，朱熹明确提出了爱民必须与民同乐，与民同乐才能自享其乐的思想。就此，他从正反两方面作了说明。在注释《孟子》“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时，朱熹说：“不与民同乐，谓独乐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穷困也。”在注释《孟子》“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时，朱熹说：“与民同乐者，推好乐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他在注释《孟子》“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时，得出结论说：“好乐而能与百姓同之，则天下之民归矣。”在朱熹看来，统治者与民同乐，使民各得其所，天下之民就会归之；统治者不与民同乐，使天下之民穷困，天下之民就叛之。

由上述可见，朱熹以历史上与民同乐者兴、不与同乐者亡的经验，告诫统治者要与民同乐。

四、富民为本

朱熹认为，统治者要与民同忧乐，而忧乐又是具体的，人总是乐富而忧贫，故朱熹说：“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尝不同。”朱熹主张“民富”，并认为“民富”是“君富”的基础。他说：“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在这里，朱熹阐述了“民富”与“君富”的辩证关系：“民富”是“君富”基础，百姓富足了，君主也不会贫困；反过来，百姓贫困，君主也